

日本政治與報紙

張棟材

——日本的報紙並不一定能反映出日本政治的真相；同時，它也未必就能代表真正的大眾輿論。
——日本報紙的大病是在其受共產黨及其同路人的滲透，本已有在言論與編輯方針上被利用為
鬥爭武器的偏向，它却剛愎自用不作醒悟自覺。

一 前言

日本在戰前已是一個報業發達的國家，戰後隨經濟復興與大眾傳播事業之擴大，更呈突飛猛進之象。良以報紙之主要內容為經常報導並批判現實政治，它能引導一種成型的意識觀念滲入廣大的讀者層而逐漸凝聚為輿論，其結果便可能發生左右政治的影響力。這種情形在日本，似乎特別顯著。

觀察日本的政治，日本報紙當然是一項重要的參考資料。不過，必須在這裏指出：日本的報紙却並不一定能反映出日本政治的真相，同時，它也未必就能代表真正的大眾輿論。關於此點，前日本首相岸信介於去年十月間在美國「外交季刊」所發表之「日本的政治動向」一文，即曾作精闢的敘述。該文指出兩點來說明日本政治與報紙的關聯性，以及政治所受到報紙的干擾：

其一是：日本要算是世界上教育程度極高的國家，全國已無文盲，每一家庭之成年男女都至少要有一種報紙，電視機的普及率亦已佔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因此，使人民對政治感到極高度的關切與興趣。

其次是：言論自由雖已完全建立，但已流入放縱汎濫之狀態。其以擁有發行數百萬份之報紙為中心的言論機關，則與政府脫節，動輒均以攻擊政府為能事，不惜誇大事實，造成煽動對政治不信任之趨勢。

羣岸於首相任內，為與美國修訂新安保條約一事，曾在國內左傾勢力所導演之「反安保運動」中備受報紙言論的抨擊，當時岸對那些自命為民意代

表的報紙也曾指摘其歪曲並褻魯民意的危險性，撰製了一個注聽「無聲的民意之聲」警句，來對抗日本報界所加於他的壓力。此次岸在其所撰專論中，又強調日本報紙對政治的關係，係基於他自身的從政經驗和考慮日本未來地位及責任的遠見，提出了「今後數年中，日本將有兩個重大政治問題」而發，而這兩大政治問題，現在就已遇到報紙所發動以反對言論及行動構成阻撓的障礙。

這位日本前首相所提出的兩大政治問題，是立於「日本為自由世界之一員」的立場而要求日本人民正視的，事實上這也正是日本政治所面對的方向。岸說：「第一個即是修改憲法的問題，這不是僅僅屬於如何修改放棄戰爭條款的技術問題，為使日本確實脫離戰後時代；重獲身為日本人之自信與榮譽，此乃為必要之舉。日本的真正復興將以此為起點，僅以電視普及，食物豐富，國民所得增高等事並不能作為復興之標準。除修改憲法外，另一則為日美安保條約的續訂問題。它將於一九七〇年滿期，如雙方有一方無意續訂，應於一年前通知對方。左翼集團當然會傾全力反對續訂，且亦定必獲得蘇俄與中共的支持。惟我相信大多數日本人民均能認清為了維護世界和平，這個條約在將來也和現在一樣地需要」。

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如何處理上述兩個重大政治問題，首先就牽涉到對來自報紙的一切反對言論的對策，這將是一場能決定日本國運的宣傳戰，今後的日本政治必然地要接受這項考驗。當前從許多跡象上都可看出國際共黨尤其是中共匪幫已在勾結日本左翼勢力正作迎接一九七〇年日美安保條約滿期

前的部署，例如共匪邀請日本青年數百名作有組織的匪區訪問活動；日本共產黨諸首領之集體訪問北平，這便是向日本政治挑戰的信號。

二 日本政治受制於報紙

日本報紙的一個特徵是三、四個大報皆以東京、大阪為根據地，發行遍及全日本各中小城市而形成為全國性報紙，在這種情況下，地方報紙難求發展，報紙所能發揮的報導、批判、主張等功能便自然而然地集中到這極少數的幾個大報手中。

極少數的幾個大報，又為極少數的幾個人所掌握，最易產生的現象當為言論的支配操縱。那些聲稱代表民意輿情的報紙，時時都要表露它的權威不容侵犯。

日本外務省發言人、文化情報局長會野明對報紙與民意輿情之關係問題曾於去年十一月間向駐日外國記者發表過直率的想法：「報紙雖與日本國內民意輿情不無關聯，但所有之報紙亦未必能足以反映並代表民意輿情。日本報紙由於推銷業務上的原因，在傳統上是反政府的」。會野的此一談話，等於是揭破了日本報界控制言論的內幕，其必遭受報界之責問反擊，迨屬意料中事。最大報紙之一的「每日新聞」在指責會野該項談話的短評欄內會諷日本外務省不啻為「美國務院的東京支店」。

去年一年中是日本報紙備受內外指責的一年。除以上所引述的岸信介、會野明對日報的批評意見外；尚有日本最大財經團體之「日經連」，亦對報紙之偏差深表異議；其來自國外的則有美國務院副國務卿鮑爾、助理國務卿麥克阿瑟、彭岱以及美駐日大使雷紹華等人對日報的嚴厲評責。這些批判日報的着眼點是共通的：他們認為報紙利用言論自由為盾牌，却只呼應左傾勢力的論調，造成一種歪曲。

日本報紙影響中央政治的幾種常用的手法，其重點並不在於以獨立主張通過論評的方式傳播，實言之，那些「社評」「專欄述評」的效果並不大。它所採取的方式乃是無中生有的近似譁眾取寵的製造、塑造新聞，烘托出戲劇化的演出效果。舉例來說，它們編導的方式常有下列兩種：

一、民意測驗：這類測驗首先是把對象區分為各階層及各地區的代表人

物，然後提出一個重要時事問題，內分簡單的幾項只能選擇可否或贊否的小項目，由報社印為書面或派人專訪徵求回答，最後則作百分比式的統計作為結論。戰後日本報紙最喜用此一手法來影響日本政治的決策，如對修憲問題，重整軍備問題，對共匪關係問題……等，皆以此手法刊出，聳人觀感。日本的每屆內閣，更常遇到報紙舉辦對內閣支持率的「民意測驗」（日文稱之為「世論調查」）的精神威脅。去年十月末當美哥倫比亞大學召開第廿八屆「美國人會議」時，日美關係的演變趨向成為討論主題，應邀出席的日方代表松本重治（國際文化會館理事長）即曾以「朝日新聞」於八月廿四日刊出日人百分之七十五反對美轟炸北越之民意測驗為依據，向美提出重大警告。最近有一、二報抨擊佐藤內閣的對外方針，也刊出了所謂「民意測驗」作證，宣佈日本人民對佐藤內閣的支持率降低。

二、時事座談會：這類座談會實際上是劇本型的論評體裁，報社已預定有結論，而是由其所選擇之人物登場道出，掀動讀者大眾之共鳴感。其能以致此之因素，係得之於◎深能抓住人民大眾的共同心理狀態，此即戰後日本人普遍反戰、反原子武器、盲目渴求和平的情緒；◎善於運用在人民大眾中具有聲望之偶像人物，使其表現為「仗義執言」之姿態，以滿足其自信更增聲望之榮譽心。因此，報社所擬定尋求答案之時事問題，都屬於對戰爭與和平將作何抉擇的範圍。如論及美國的核武器進入日本問題，則邀請最初獲得諾貝爾獎金之核子物理學家湯川秀樹出席發表反對論調；涉及越南戰爭，更動員傾向中立主義而受大眾歡迎之社會名流、學者、作家、影劇演員等在座談會中激昂陳詞，報社舉辦座談會例有「司會」人員從旁助演，將結論導向預期之「中立、和平、反美」等主旨，自然就成了順理成章之事。

上述兩種編導方式，經常間歇地出現於日本各大報，它們都是佔據了第一版的大幅地位。現在應予檢討的是這種方式是否合乎報紙的正確性格問題。報紙的功能不應照共黨首魁列寧、史達林、黑魯曉夫等解釋為「集體的宣傳者、鼓動者，更為集體的組織者」；「最鋒利的武器」；「遠距離射程力量的思想武器」，日本報紙所採取的上述兩種方式，却在形式與實質上，似乎都接近了這種作風。

三 日本報紙與日美關係

日本為自由世界之一員，這是為日本朝野所一致承認的。按自由世界之有所別於共產集團者，首先就是它的反共立場與使命。可是在日本報界，却將「反共」視為「反動」的同義語，逐漸擴大為社會上的禁句了。當「亞洲反共同盟」在日本舉行會議時，即向以反共態度明朗見稱的日本前首相岸信介也不得不顧慮到此一現實，而以「維護自由」來代替「反共」的字眼。

日本和美國的關係近已面臨緊張的危機，主要就是由日本報紙所釀成的。美國朝野對此感到憂慮的也是根據了日本報紙的資料而來，如引證日報所辦民意測驗透露在過去一年中，認「美國為最受歡迎國家」的日本人已由百分之五十一減至百分之三十七。甚至詹森政府的一位高級人員在被詢及美外交政策時會稱：「我們應經常注意日本，如果越戰繼續，無人能知道他們會偏向那一面」。(見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廿日號Newsweek)

在去年一年中日美間的不愉快事件，皆由日本報紙所引起，本文前節已列舉了美國務院官員對日本報紙的批判。日本報紙在報導越戰的偏差上，愈來愈露骨，這確是日美關係的困惑。綜計去年日本報紙為越戰問題投向日美關係的陰影，有以下數端：

一、去年四月初旬，在美參院秘密會議中討論到日本報紙「朝日」[每日]對越戰新聞報導有欠正確時，國務院副國務卿鮑爾及助理國務卿麥克阿瑟曾出席作證稱：「朝日與每日兩報已為共產黨員所滲透，在朝日之編輯部內約有二百名以上為共產黨員」。此一證詞經公開發表後，該兩報立即加以反駁，一時會引起軒然大波，迫使美國務院正式表示遺憾；美駐日大使雷紹華聲明日本報紙未失客觀性後，始告平息。

二、十月五日，美駐日大使雷紹華於大阪日美協會演說後接見日本記者時，一反其以往對日本報人之容忍與婉轉說服之態度，痛責日本報紙對越戰報導之不當，會指明朝日新聞特派員秦正流的越戰報導及每日新聞特派員大森實發自河內之通訊，皆係照抄警察國家之宣傳品而不惜大肆渲染，雷紹華對此種甘願供北越共產黨政權宣傳工具且故意抹煞一切有關越南政府正確報導的日本報人行為，認為「根本欠缺做新聞記者的資格」。雷紹華非不知以美大使身份對駐在國之報紙竟如此公開予以酷評，自必將加深日本報紙對美國之對立形勢。然事態之嚴重似已將其逼至「忍無可忍之地步」。

三、十月三十日，美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彭岱發表演說，

亦針對日本報紙之論調指稱：「日本輿論對越南及中共情勢有着危險的錯誤認識。「美國人會議」對於美國與日本報界關係之惡化，亦於是日作專題討論，建議舉行日美報人討論會以求改善此一不幸情況。其後，美國官方及民間報紙陸續積極展開直接與日本報界接觸之工作，但並未稍能扭轉日本報紙之左傾論調。」

四 結 語

戰後日本報紙是在享有充分言論自由的滋育中壯大成長起來的，它所建立的勇於自我批判的反省精神，為新的日本探索進路，是值得稱讚的一面。它對日本政治如在反官僚主義、反貪污腐化上所發揮的力量，也正如前首相岸信介在上述「日本的政治動向」一文中所稱：「已盡到作為政界淨化裝置的機能，促成日本政治的進步。」

日本報紙的大病是在其受共產黨及其同路人的滲透，本已有在言論與編輯方針上被利用為鬥爭武器的偏向，它却剛復自用地不作醒悟自覺。

岸信介預測了今後日本的兩個重大政治課題是修憲與日美安保條約的續訂。若照當前的日本報紙作風看，它決不會支持這兩大政治課題的推進，而且只有相反地橫加阻撓。不過，最主要的還是要取決於日本政治領導者們的膽識。日本如果不從修憲擺脫第九條的束縛着手，則是難以成為健全的自由世界之一員的，因為基本條件是要具備敢於以實力對抗共產主義和反共的精神支柱。但今天的日本，能像岸信介那樣有勇氣提出問題所在點的政治家，却並不多見。

訂 正

據張維亞先生來函稱：「上期貴刊所載拙作「最近兩年共匪對外貿易分析」一文內，共匪對沙撈越Sarawak之貿易，原稿誤列在非洲統計表內，特請訂正，並向讀者敬致歉意。」